



林獻堂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 林柏維*

會員雖少，一人可以當千，故千餘人就可以看做百餘萬人，因會員以外同情者很多，雖有誤解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

林獻堂〈文協第六回總會・總理講話〉

1. 從阿罩霧三少爺到台灣領袖

百年前台灣的這一塊土地上，有那麼一群人，引領人民在殖民體制下從事反日的社會運動，企圖擺脫異國統治而獨立自主，他們在 1920 年代掀起歷史的狂飆巨浪。然而，歷史灰飛湮沒之後，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一切都過去了，與被殖民、被壓迫、被奴役的鬥爭，彷彿都不曾存在似的，20 世紀末葉，本土意識逐漸覺醒，蔣渭水、賴和等台灣菁英始能從歷史的夾縫中窺見陽光，然而誰在乎台灣第一人：林獻堂？

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做為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運動領袖，其形塑與其家族有著緊密關係；觀照歷史，家族的興衰過程可以是一個區域或是整體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家族成員常因緣際會在不同的時代裏引領風騷，而他們的表現自也關係到家族的起落。

* 本文為應臺北市文化局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邀請之推廣活動講演稿，2017.9.23。

* 林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觀看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因緣於時局轉換，鹿港辜家、高雄陳家與基隆顏家與統治者搭線，迅猛崛起；同屬興旺於清代的板橋林家、霧峰林家，則在歷史轉換的變局裏有著類似的選擇：先是避秦於原鄉，繼而歸返接受統治當局的安輯綏撫，不同的是：霧峰林家的雙元選擇，林烈堂妥協於時局，林獻堂卻逆向操作，踏向民族運動的不歸路。

霧峰林家的雙元選擇表現在家族民族主義信念的傳承上，頂、下厝兩個系統恰好應照著文治武功分離的現象，下厝的林文察建功於戴潮春事變、林朝棟奮起於台灣民主國、林祖密參與孫中山二次革命，祖孫三代軍功顯耀；頂厝的林文欽則為舉人功名出身。1895 這一轉換的年代，卻使林獻堂有了戲劇性的轉折變化，下厝後繼乏力、科舉無路的阿罩霧三少爺承擔起整個家族的興衰重擔。

林獻堂在父親林文欽的薰陶下，溫文儒雅，使其在政治態勢上有著溫和、改革、漢民族的特質，而下厝的顯赫武功則薰陶其領袖風格。林獻堂的政治態度在此，其對教育的格外重視也在此。

林獻堂對台灣前途的憂心與抱負，起始於 1907 年與梁啟超的奈良偶遇。林獻堂詢以「台灣該當如何？」梁啟超回以：「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¹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議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

1913 年，林獻堂踏出了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

1913 年 5 月，林獻堂經由引介認識明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²板垣認為東亞若要安定，須中日合作，而台灣人是中日親善的關鍵，於是在 1914 年 12 月，集結台灣各地仕紳成立「台灣同化會」。³這一舉措違背台灣總督的意旨，次年即給予解散。

¹ 林獻堂向梁啟超詢問：「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74.12，頁 519~521。）

² 「板垣認為可利用台灣實現他的政治理想，於是便以林氏為知己，拿他作渡台的橋樑。」張深切《里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頁 96~97。

³ 「可以說是當時台灣社會上的上流人物，實際上大部份的會員都是區長、參事、保正等身膺榮職的縉紳。」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20~21。





林獻堂在台中中學創校的過程展現集結上層仕紳的實力，而同化會也恰好給林獻堂熟知組織各地仕紳的方法與契機，隱然已是台灣人的領袖。

2. 領導台灣文化協會

1920 年代，是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們以文化運動的方式，拓展出爭取政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民族的運動；他們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⁴。

相對於整個國際環境，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社會主義浪潮的湧現、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抬頭、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新，相輔而成國際潮，台灣經由日本「母國」而介入。因歸屬的相互關係，日本社會自然成為媒介，受日式現代教育的知識菁英即在此國際潮中前進。⁵

這國際潮含括了：民族自決的潮流⁶、列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⁷、愛爾蘭獨立運動模式的仿效、朝鮮三一事件的推波助瀾⁸、大正民主的歷史時空⁹。留日新青年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思慮台灣的前途，集結在蔡惠如、林獻堂的領導下組織啟發會、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轉而進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¹⁰

先是 1918 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 1920 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年》（後來改題為《台灣》），1923 年改版發刊《台

⁴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字句見於：蔡培火〈我島與我等〉，《台灣青年》，期 4，頁 4，1920

⁵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0-52。

⁶ 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促成東歐、西亞民族國家的獨立。

⁷ 中國革命的成功激勵了新知識青年寄託新中國把革命的目標轉向台灣，孫中山的思想及其動向成為有志者（蔣渭水）學習的榜樣，祖國情結成為與對岸相脈動的根源，也伏下日後中、日、台三角關係的思想、路線糾葛。

⁸ 1919 年，朝鮮高宗暴死，釀成反日風潮，李承晚組臨時政府雖失敗，卻換得地方自治，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應起而仿效。

⁹ 主張民本主義的吉也作造組織新人會（1914）、黎明會（1920），使民主主義在日本蔚為風潮，留日學生受此薰陶，思想大開，加上 1919 年田健治郎任台灣總督，文官統治時期開始，給與知識菁英有了社會結社的空間。

¹⁰ 受到 1910 年代的國際潮的衝擊，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的菁英省思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引發王敏川、林呈祿等人的路線爭執，先是決議進行廢除六三法（後來改稱三一法，是台灣總督統治的基本法）運動，最後採納林呈祿的主張，走體制內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林獻堂領導下，歷時十四年（1921~1934）、請願十五次。

灣民報》)，自 1921 年起，憑其資財、人脈，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

相對應於留日新青年的積極作為，島內以台灣醫專、師範學校出身為主的菁英，推舉蔣渭水為領導，共謀出路，先是成立文化公司，繼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會員 1032 人，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後為蔡培火），文化協會的組成代表著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的結合。

文化協會成立後，迅速發展它的組織，分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個支部，並且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文化運動所形成的磅礴氣勢，使台灣總督府採取了壓制的措施，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務，來打擊林獻堂的事業，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1922 年）¹¹。再以台北師範事件（1922、1924 年）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1923 年，先是以公益會來反制文化協會，並以有力者大會來反擊，進而於 1923 年 12 月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大逮捕重要幹部，此即治警事件，¹²1924 年，更以二林事件的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文化協會經受這些衝擊反而更加蓬勃發展。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林獻堂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就是這樣的意思。

啟蒙運動為主的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在訊息的傳遞上，他們發行會報、設讀報社；在教育的層級上，他們辦夏季學校、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在知識青年的結合上，他們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在文化種子的傳布上，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在

¹¹ 1922 年，台中州知事常吉德壽挾持林獻堂加入日台融合團體「向陽會」，並與楊吉臣、林幼春、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訪見總督田健次郎。當局宣稱林獻堂已向田總督保證停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遂引起留學生的不滿，此即所謂「八駿事件」。總督府當局更施以高壓，以所控有之銀行逼催欠債，迫使其陷入困境，林獻堂遂無奈地聲明退出請願運動，諸多學生不察，交相指斥為「軟化」，脅迫、侮辱之書不斷，甚且有鷺江柳裳君之小說〈犬羊禍〉刊載於《台灣》雜誌，醜詆林獻堂誤族殃民。（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196。）

¹² 林獻堂於 1923 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拘捕 49 人，蔣渭水等 13 人被判有罪，此即治警事件。



社會風氣的開通上，他們提倡新劇，組電影隊。在經濟面的抗爭上，他們成立本土資本的銀行；最重要的是，他們廣泛地、連續地舉辦各式的演講會，直接向民眾進行宣導、教育，從支部的文化講演、政談演說、農村講座到東京留學生巡回講演，掀起全島文化啟蒙的熱潮，使「文化仔」在二〇年代成為「進步」、「改革」社會標籤。

在文化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難有著力點、外圍團體日趨成熟、左翼路線已成氣勢的情勢下，在「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中，仍走向1927年的大分裂。¹³

左翼的連溫卿、王敏川掌控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右翼的蔡培火、蔣渭水另於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路線。¹⁴

轉換方向後的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為中心，本部設於台中市，展現與舊文協時代完全不同的風貌，「主張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1928年4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決議：「利用文化協會作為共產黨活動的舞台」。1929年11月，謝雪紅及台灣共產黨掌握了文化協會，1931年日方大逮捕台共黨員，文化協會被迫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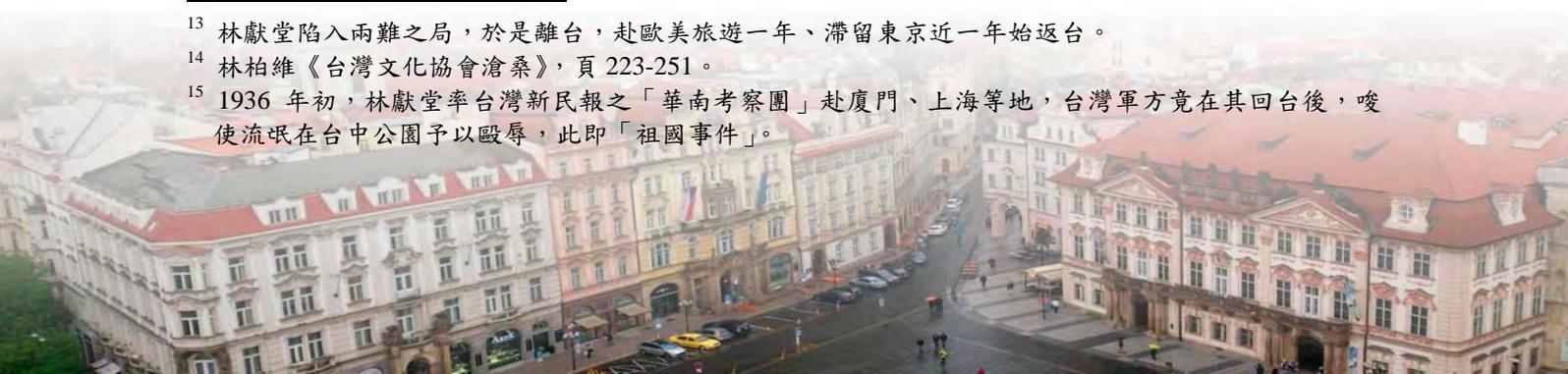
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在蔣渭水的領導下也逐漸左傾，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等脫離，於1930年8月，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由楊肇嘉主導。分裂後，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1931年2月，急進的台灣民眾黨被禁止結社，狂飆的二〇年代落幕。

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1934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35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台灣舉行有史來第一次選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徒呼奈何之際，復遭「祖國事件」¹⁵的羞辱），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階段任務完成，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為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休止符。

¹³ 林獻堂陷入兩難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

¹⁴ 林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223-251。

¹⁵ 1936年初，林獻堂率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使流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



3. 林獻堂的教育理念

矢內原忠雄指出：「1926 年末時台灣人的公學校（約今之小學）就學率僅百分之二八·四弱，而在台日本人則為百分之九八·二強。」¹⁶是日本統治台灣之愚民政策，

日本統治台灣後，傳統的書房教育因科舉制度的不存在漸失魅力，日本在台灣雖大力普及新式的公學校（小學）教育，然而在「愚民政策」（要使被統治者沒有智識能力，組織無能化，使廣大的被統治群眾成為供給勞力的被奴役者。）的統治基調下，上一層級的學校僅有實用的「國語學校（1896 年）、台灣醫學校（1899 年）、農林學校（1919 年）、商業學校（1919 年）」，台灣青年如想繼續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除此之外，只有海外（主要是日本、中國大陸）留學一途。

傳統仕紳教育出身的林獻堂，其視野是前衛的、遼闊的，他關注時局的發展而深明統治當局在台灣推動普及教育的動因與目的，面對時代潮流趨勢，認識到現代教育的必要性，在政局的羈絆及各人能力的範圍下，將霧峰家族子弟及資助少數貧苦青年到日本接受中學以上的教育，自己因而常往返日本，與青年們常相探討各種問題，也開拓了自己的視野，1927 年的歐遊更因而強化了個人的世界觀，在這樣的生活體驗中，深明教育是民族覺醒的活路，正規教育是爭取的事業，退而求其次，辦報紙、開讀報社、文化講演、講習會、夏季學校等文化運動是啟迪民智的補救方式。民智不開，民族運動的發展必然受限，正規教育不能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將淪落到被同化、奴役的命運，無法建立有尊嚴的現代國家。

林獻堂教育理念的實踐可區分為三個區塊：其一、台中中學的建立，其二、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台灣民報（讀報社）、文化講演、夏季學校，其三、萊園中學（從一心義塾到明台中學）的經營。

¹⁶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39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6，頁 76~77。



4. 文化運動下的理念實踐

4-1 台中中學的建立

林獻堂除了將其子女送往日本之外，也資助貧苦青年，得到支助的畢竟是少數，1912年，林獻堂以祖母81歲壽辰禮金為獎學基金，後擴大募集¹⁷，轉而於1913年9月，由台北、中部各廳台人有志者十六人向當時之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請願創設私立台中中學¹⁸，幾經波折，最後以辜顯榮及林烈堂的名義，代表蔡蓮舫等83人，於1914年2月向總督府捐獻校舍，換取以專收台人子弟的條件，公立台中中學創校。

然而，台灣總督府豈有輕易放棄堅持已久的「愚民」既定政策之理，其順水推舟的態度，已經很明顯地表示私立中學創設的不允許，進而想利用這筆錢來設公立中學，以免失去對於學校的經營權、控制權。初，並不拒絕請願，僅於1913年11月由民政長官下令台中廳長轉知呈上計劃，即可許可，學務部對於校舍、建築物等只要求須合指定型式，並須受台中廳的指導。¹⁹

到了12月，學務部長隈本繁吉要求召集代表人辜顯榮、蔡蓮舫須擴大募捐，由發起人負責施工，一切須受台中廳指導，最後以辜顯榮及林烈堂的名義，代表蔡蓮舫等83人，於1914年2月28日向總督府提出捐獻建築等一切設施，3月28日，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遂才批示許可²⁰。

私立轉為以專收台人子弟為條件的公立台中中學，與原來意旨雖不盡相符，建設

¹⁷ 「節省祝費，擬作獎學財團，翁從兄烈堂先生起倡和之，真是德不孤，應者四起，募得巨金。間有人提議以獎學為消極，進一步請設私立中學，議遂決，舉翁與烈堂先生及其他六七人向督府請願。」（甘得中，前引文，頁518。）

¹⁸ 所持理由是：「初等教育普及之結果，各地需要更進一步接受中等教育者，漸次增多。然以台灣缺乏中等教育機關，不得已而遠渡重洋，不辭萬里奔波，負笈東都者，日日增加。為台灣學子之前途計，確有設立之必要。於是台灣人士有意釀集巨金，建設台人中學，其校舍及其他必要之設備，當以捐獻實物為條件。」（林烈堂《台中第一中學校創立及紀念碑建設經過報告書》，轉引自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8。）

¹⁹ 台灣總督府認為「本島人（台灣人）向學心如此之切，不予批准，青年學生勢必向外，若留學內地（日本）影響尚少，若往大陸感染惡思想，實屬堪虞，如予批准，將來學校之管理亦有未妥，乃決定由督府建設。」及要求諸人將這筆錢捐獻。（甘得中，前引文，頁521。）

²⁰ 批示許可字號為「附中庶第一三三一號」，參見林烈堂，前引書，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48～50。

委員²¹們仍不辭勞苦，鳩工募貲，集資金 24 萬 8820 圓，築成佔地 1 萬 5 千坪，校舍輝煌之台中中學，於 1915 年 5 月正式開校，所謂「吾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²²至此中學雖已設立，但並未能疏解當局之「愚民政策」於萬一，徒得空名而已，林獻堂諸人欲以「私立中學」做為培育台灣青年之搖籃的計劃，無疑的是失敗了，卻是台灣人民以台中為大本營之民族運動的先聲，也伏下台中中學及其後身台中一中特富民族思想的傳統校風。

4-2 文化協會的啓蒙運動

(1) 台灣民報（讀報社）

日本治台時期，控制所有的言論機關，對於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幾乎不揭露，在東京發刊的《台灣青年》（後身《台灣》雜誌）無法進行報導，只能刊載批判文論，林獻堂、林呈祿、林幼春、蔣渭水等人深感必須創辦一份週刊的必要，以為報導、批評時事的媒體。

1923 年 4 月 15 日《台灣民報》在東京創刊、發行再運送台灣，當局對該報「取締之嚴，跡近瘋狂，對礙目之記事，恣意剪除塗銷姑勿論，扣留禁止之頻繁，幾乎令人難於置信。扣留報紙之最高紀錄曾及半年之久。」²³由於警吏之干擾，於是文化協會決定自力創設讀報社，供民眾自由閱覽。前後共有：台北、新竹州苑裡、大湖，台中州

²¹ 當時選出之建設委員計有：新竹廳鄭拱辰，台北廳林熊徵、李景盛，台南廳陳中和，嘉義廳徐杰夫，南投廳林月汀，台中廳林烈堂、蔡蓮舫、林獻堂、吳鶯祈、辜顯榮等十一人，並共推舉林烈堂為委員長。

²² 〈台中中學創立紀念碑〉碑文為：「吾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百凡草創；街庄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留學於內地（日本）者。夫以髫齡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里外，微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為憂，知創立中學之不可緩也。」此碑豎於台中市台中一中麗澤樓後。

按：文下接：「歲壬子，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諸委員，乃起而力請於當道。大正三年，甲寅，三月四日，蒙佐久間督憲許准。於是委員等自投巨金以為眾率，不辭勞瘁悉力於募貲鳩工等事，賴各方之踴躍捐輸，共集金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二十圓，乃於四年五月開校，同年三月經始築至翌年十二月告成，佔地一萬五千坪，工費廿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圓餘。學堂宿舍齊備，蓋亦燦然大觀矣。殘金三萬餘，充作圖書備品等費，以供學子研鑽之資。」

²³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1974.12，頁 67。

按：讀報社之設置，在《民報》發刊之前已有設置。葉榮鐘所述之原因應是除《民報》外尚涵括了《台灣青年》、《台灣》才是。





草屯、彰化、北斗、員林、社頭，台南州台南、嘉義及高雄、屏東、岡山等 13 處讀報社²⁴

讀報社所需費用皆仰賴於本部的供給²⁵，負荷沉重，兼又發生台北師範事件，1924 年末，除台北、彰化、台南外，其餘皆停辦。²⁶

(2) 講習會

短期講習會是簡易可行的教育方式，文化協會舉辦的講習會共有：

◎**短期講習會**：1923 年，台北支部舉辦了 3 回短期講習會：第 1 回是連雅堂的「台灣通史講習會」（台北讀報社），第 2 回是蔡式毅的「通俗法律講習會」（台北讀報社），第 3 回是蔣渭水、石煥長、林野的「通俗衛生講習會」（港町文化講座）。

◎**通俗學術講座**：1923 年，由台北支部舉辦，共計 44 回。

◎**長期講習會**：1924 年，台北支部舉辦連雅堂高等漢文講習會。

◎**西洋歷史及經濟學講習會**：1923 年，台南支部舉辦林茂生西洋歷史講習會（9 回）、陳逢源經濟學講習會（12 回）。

◎**通俗學術講演會**：1924 年，台南支部、彰化支部分別舉辦。

(3) 夏季學校

台灣總督府為遂行其愚民政策，以「私立學校規則」抑制「講習會」²⁷。蔡培火抨擊台灣教育政策是惡政：「同化啊！以汝的名而行的國語中心主義，已將我們的活動能力加以抑制，我們的人材概歸無能化，舉凡政治的社會的地位，非任令母國人獨佔不可。因此，後藤新平的八十年同化說，可以解釋為使我們永久作奴的秘策。」²⁸面對舉國皆奴這樣的窘境，文化協會在第六次大會（1923 年）依然決議：暑假期間在霧峰林家花園（萊園）開辦夏季學校，以萊園為校舍，並且提供膳宿。

◎第一回夏季學校

²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 148。

²⁵ 〈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台灣民報》，卷 2 號 4，1924.3.1，頁 15。

²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 148。

²⁷ 〈多設夏季學校的必要〉，《台灣民報》，號 119，1926.8.22，頁 3。

²⁸ 蔡培火《與日本國民書》，台北新店，學術出版社，1974.5，頁 7~8。



1924年8月10日起至16日，參與學員有男45人，女10人，共55人，正課外，尚有自由活動、懇親會、課外講演。講師及課目參見下表：

夏季學校師資與講授科目表

第一回夏季學校		第二回夏季學校		第三回夏季學校	
講師	課目	講師	課目	講師	課目
連雅堂	台灣史	陳炘	經濟概論	林茂生	西洋文明史批判
上與二郎	理論宗教（基督者之信仰）	陳逢源	經濟思想史	林幼春	東洋學術史概論
林茂生	倫理哲學（道德思想之進化史）	林茂生	西洋文明史	林履信	社會學
*松本安藏	一燈圍生活	林幼春	中國文化史	謝春木	新聞學
*黃朝清	精神療法	蔡式毅	憲法	*蔡培火	人生我觀
*渡部彌德氏	憲法之解釋	蔡培火	科學概論	*陳紹馨	星宿講話
*奧村安太郎	大亞細亞主義	*鄭松筠	有關契約的注意	*陳逢源	資本主義的功過
		*陳滿盈	孝	*鄭松筠	法的精神
		*陳朔方	就衛生而言	*陳滿盈	結婚問題
		*王受祿	外國事情	*前田武夫	何謂自治

姓名前標註*者為：課外講演

◎第二回夏季學校

1925年7月27日至8月9日，參與學員有男63人，女20人，共83人。陳炘在開學典禮中敘述夏季學校之目的：「其一，為有意義之休暇，其二，有職業者利用此時攻究學問，其三，學校教育的延長補足。」²⁹王受祿在〈外國事情〉講演中，以德法邊境的亞爾薩斯與洛林為例，沈痛地指陳被殖民的悲哀，並繼蔡培火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後提出：「我們需要把『台灣是世界的台灣』的念頭置在腦裏才好。」³⁰

◎第三回夏季學校

1926年8月6日到8月15日，參與學員有男50人，女20人，共70人。林獻堂在開學茶會上，以〈台灣人青年應走的路〉為題致詞：「天助自助者，吾人為貫徹目的，今後遇到任何障礙亦須不屈不撓，此時雖為奴隸也要隱忍……必須研究建設比今日更加美麗之新台灣的方法，這是須要不屈不撓的努力的，捨棄依賴心，在獨立自主中鞏固團結，此事當不可或忘，以相互扶助之精神指導我們同胞。」³¹

²⁹ 〈夏季學校開校式〉，《台灣民報》號65，1925.8.16，頁5。

³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153。

³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前引書，頁153~154。



4-3 萊園中學的經營

不得不為奴隸的挫敗感，道出林獻堂領導下「台中中學」運動迄「夏季學校」的辛酸血淚。1927 年的文化協會分裂，運動方向向左轉，夏季學校隨之停頓，然而，霧峰一新會、萊園中學、明台中學讓林獻堂的夢想仍能繼續編織下去。

1932 年，林獻堂為推動平民教育，以「促進農村文化，廣佈自治精神，以助建設新台灣」為主旨，在家鄉創辦「一新會」，取其意為：「清新之氣，再造台灣，一新眾人的生活。」次年 5 月 15 日開辦「一新義塾」漢語講習所，林攀龍任塾長。

戰後，林獻堂延續他創辦台灣人自己學校的初衷，在 1949 年 5 月 15 日成立「私立萊園中學」，由林攀龍擔任校長，一時間俊彥匯聚、英才輩出，成為全台最優良的中學校。更於 1976 年遷校址到霧峰林家花園，1987 年因應社會需求改制改名為：「私立明台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今名明台高中）。

5. 太平何日度餘年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協助安輯時局，竟也列名「台籍漢奸」。1946 年省參議會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緣，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園付浮沈。解愁尚有金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1947 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痾為名，於 1949 年 9 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思鄉卻不歸故里，「亂絲時事任逆遭，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



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1956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

林獻堂的教育理念含蘊在他的政治思路中，其實踐與其在議會運動的努力自不能相比，然而涓水長流，所行所為都是盡一己之力，無私無我，所願者，從家鄉培養的人才能滿地開花。

